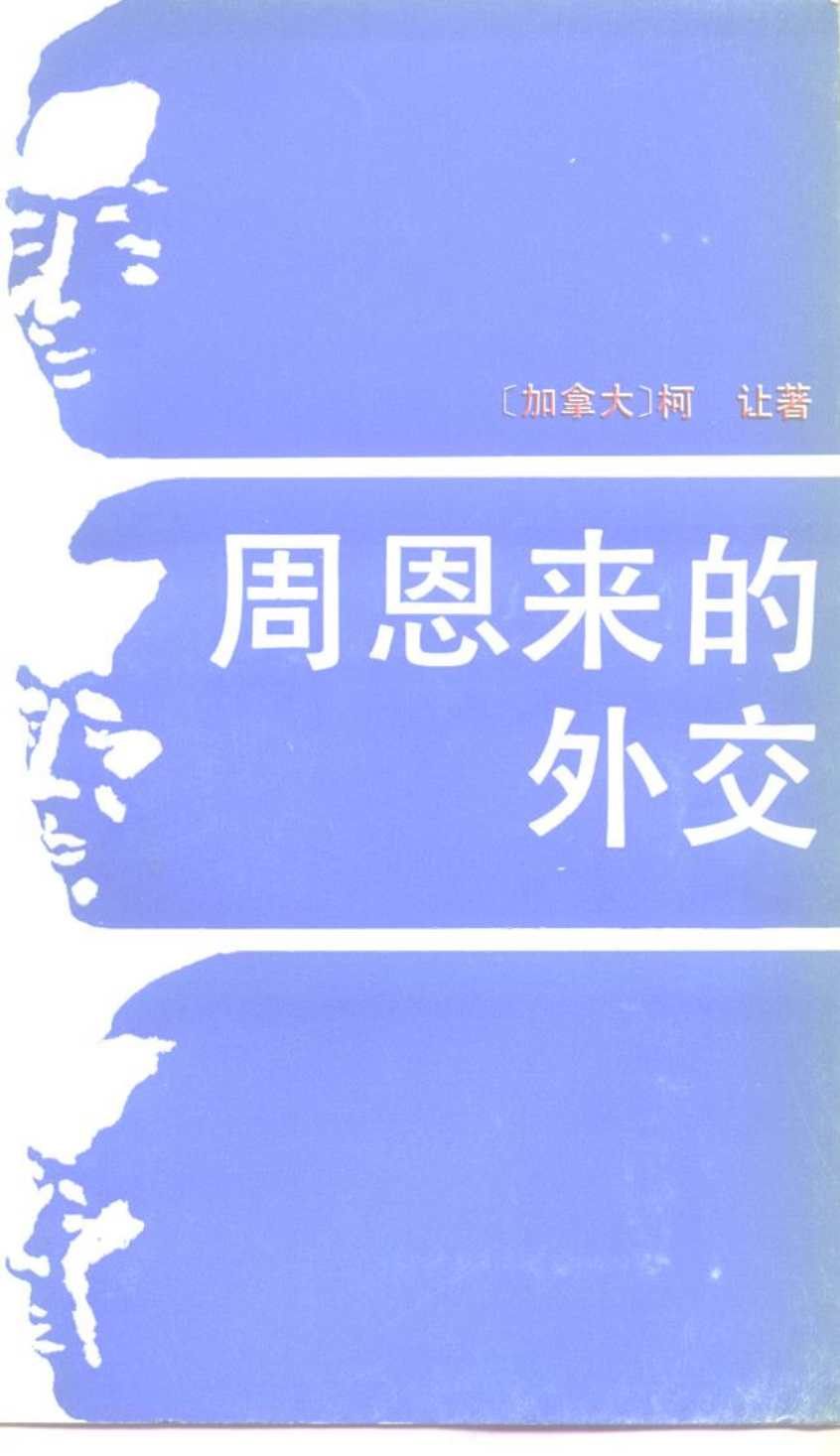




〔加拿大〕柯 让著

周恩来的 外交

D 520
4

· 82183

〔加拿大〕柯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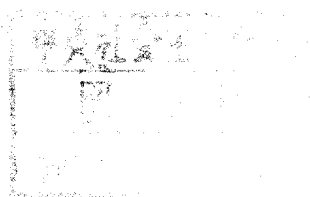
汪永红译

DH 19/07

周恩来的 外交



200055796



東方出版社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St. Martin's Press

据美国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第1版译出

周恩来的外交

ZHOUENLAI DE WAIJIAO

著者/[加拿大]柯 让

译者/汪永红

责编/颜玉强

封面设计/金 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冠中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74,000

版次/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3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66-3/D·65 定价 3.40 元

中译本序言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和国务院总理，他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不仅是这一政策的制订者和奠基人之一，而且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实践者。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以他那令世人倾倒的绝世才华和完美的策略活跃于中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为加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为反帝反霸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风格和外交思想不仅一改旧中国外交上的屈辱形象，而且给世界外交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的外交思想和主张——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已成为当今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由于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内外从事周恩来研究的爱好者与专业人员日益增多。国外对周恩来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30年代中期，当时随着国共两党开始共同抗日，国共谈判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和传奇人物周恩来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随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西方记者及驻华外交官员过往甚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因此，外国使馆人员写有许多回忆录，忆及周恩来此间

的外事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它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对周恩来研究也予以重视。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国外掀起了周恩来研究的热潮，而且至今方兴未艾。

周恩来历任中国总理长达26年（兼外交部长8年），他不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方针，而且他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在广泛的国务活动中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他崇高的思想和品格给各国首脑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外国领导人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人物。这些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作为外交家的周恩来的生动材料。印度尼西亚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治回忆录《我的历程》专列三章回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他称赞周是“伟大的外交家”与国务活动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以及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回忆录《瞻望未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周恩来的谈判艺术均有不少论述。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将周恩来作为世界著名领袖专章评述，对周恩来评价甚高。他对周恩来的品行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共产主义信仰使他能忍受政治上的挫折与生活上的艰辛；儒家风度的个人品德使他能在外交折冲中出类拔萃，并成为中国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的机敏，使他能够准确估计内政外交之后的各种力量，……调解人的策略与礼貌使他在激烈分

于分裂国家时能保持国家统一。”*

海外学者盛赞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杰出功绩。海伦·斯诺在其著作《旅华岁月》中高度评价周的外交成就：“周恩来是天生的外交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如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基点在于联络，在于寻找共同基础与连结的纽带。”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都与周恩来分不开，他以丰富的经验策划中国的外交路线。谈到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的起点，海外学者大致认为始于西安事变。此后10年中，周一直是中共对外的主要发言人。他在国统区与知识分子交往时彬彬有礼的风度以及与西方外交官的经常晤会，大大提高了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周恩来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国共折冲还是在建国后对外国的交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斗争艺术，使得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敬佩他的人格与外交才能。他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风格。《周恩来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认为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周恩来个人外交才能的成功。

《周恩来的外交》奉献给读者的就是周恩来一生中、也是世界外交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章——周恩来的外交生涯。

本书作者柯让(Ronald C·Keith)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多年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推出的这本《周恩来的外交》是系统地介绍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风格的专著，是当今国

* 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页。

外研究周恩来的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者综观周恩来的整个一生，认为周的外交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可追溯到他年轻留学欧洲期间对当时国际局势及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关注；他的战时重庆生涯促成并磨砺了他的外交风格和才华，也奠定了他的外交思想基础，尤其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建国后的直接外交实践更使他的外交才智大放光彩并达到了炉火纯青。

作者认为，周的外交思想无疑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同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古典战略的影响，并且他对源于欧洲的西方传统和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也无师自通。“周的外交形成于盘根错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之中”，而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并没有影响他外交的理性实践，“他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外交家，然而，他却被举世公认为一位完美的外交巨擘。”作者认为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包括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非凡的调解才能，更多地反映了他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而不是他的对手和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认为的“实用主义”。他的外交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而巧妙的结合，他的“现实主义”是从统战政治实践经验中形成的严谨而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是周恩来的“现实主义”外交才有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才使得周对国际政治作出了准确的分析。早在70年代初他就“高瞻远瞩地洞察到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国际政治联盟的延伸，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作者极为推崇周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认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早期中苏关系、中

印关系、中美关系等是这些外交方针的突出实践。作者着力描述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对此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此书现由从事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汪永红同志全文译出并由东方出版社印行，这对于我们研究周恩来和中国外交及其有关学科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当然，由于研究角度、掌握和选择材料、特别是指导思想体系的不同，作者有些观点以及他对史实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在资料引用上，作者部分依据了西方的一些不确切材料，有的甚至援引了“文革”期间一些无可靠根据的红卫兵小报材料，这是不妥的。因此在出版中译本时，在个别地方略去未译。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林 代 昭

目 录

序论	革命事业中的“理性外交”……………	(1)
一	革命中成长的外交家 (1919—1949年)……………	(14)
二	冷战时代外交部的建立……………	(38)
三	“和平共处”与日内瓦——万隆会议 ……	(70)
四	“和平共处”与中苏分裂……………	(107)
五	周恩来、尼赫鲁和“亚非团结”……………	(143)
六	文革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83)
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战略与 现实主义……………	(219)
八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	(253)
	作者鸣谢……………	(261)
	译后记……………	(262)

序论 革命事业中的“理性外交”

外交活动一向被看作是欧洲外交界的事；然而，在中国革命纷纭的时代却脱颖而出出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显然是诞生于中国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的，但其与生俱来就呈现出重要的国际意义。还在留欧求学期间，周就很有意识地注意当时欧洲的外交活动；成年时，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他在欧洲的国家制度向非洲和亚洲地区扩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周恩来看来，欧洲外交语言和原则中有价值的仅仅在于主张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信奉民族自决、互惠和平等这几点而已。作为一位投身革命的革命家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欧洲外交中所采用的国际等级秩序原则常常深表不满，尤其当这些原则增强了殖民地的不平等和依附性时。他充分理解实力，但他极为感兴趣的却在于为贯彻原则而对实力的运用上。

周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不言而喻。但是，周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解会不会妨碍他的外交的“理性”实践呢？回答是，周恩来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外交家，然而，他却被举世公认为一位完美的外交巨擘。

周担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1949年—1958年2月),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从1949年直到他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从事外交活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并产生了巨大的建筑师般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他的领导,中国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人民外交”和对外援助战略。周的“理性”外交即使在看来难以对付的冷战环境中也使得中国突破了美国的对华遏制。他卓越的灵敏性和政治上的弹性在后来野蛮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中得到了考验,其非凡的忍耐力被证明确实是超群绝伦的。早在70年代初期,周就高瞻远瞩地洞察到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国际政治联盟的延伸,并且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因此,周恩来的外交经历无疑是当代外交史上最为迷人的一章。不过,对周恩来整个一生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既艰难又富有争论。除了少数例外,中国方面对他的评论也不得不越过悼词中仅对他作出的“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的评价,而开始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实践。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特别是那些在传记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个人崇拜”的因素,都束缚了中国对周的研究。

西方有不少周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常常将周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加以一般地基本心理因素分析,并以此来解释他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个性。约翰·鲁兹在他的传记中提到,在冷战期间,西方新闻界对像周恩来这样的“神秘人物”着了迷,描述他的用词应有尽有:一位“舌剑唇枪的绅士”、“富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橡皮共产主义者”、“中国的斯芬克斯”等等。

甚至在他去世期间,周恩来之谜仍引起了一些观察家们

的好奇,这些观察家们试图通过对周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以获得对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解释。在最新的一本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中,迪克·威尔逊从周的感情和动机的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中对周的“理想主义和求实精神的奇妙融合”作出了分析。威尔逊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周是“入乡随俗”,对不同的文明产生不同的印象。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从周的性格和举止中很容易看出他们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也在周那里得到了确认,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周作为外交家的非常成功之处。

周在原则发生冲突的困难场合中达致调和的能力可能与儒家的“中庸”传统有关。他的一些国外崇拜者们,尤其法国人,评论他的风度时将他看成是儒家君子的现代榜样。早在50年代,尼赫鲁就确信,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最终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体现出来。就连曾和周一起从事外交工作如今仍健在的人,也无不强调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周的外交战略方针之间是有联系的。

当然,周恩来对过去儒家的看法是复杂的。40年代早期,他曾斥责过蒋介石虚伪的“诚”,并且把蒋介石的“中庸之道”看作是一个完全浸透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的言不由衷的典型。然而,在1949年4月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分析传统”需要对过去儒家的有积极意义的特性进行研究。儒家所宣称的精英主义与党的群众路线是相冲突的,但是就连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也表示,儒教对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外交是有影响的。

例如,传说中的贤王舜乐于不耻下问,并乐于对自己所得到的不一致观点进行研究,以把握住两个不同的极端,以便在

制定政治政策中取其“中庸”。“中庸之道”信奉“和睦相处”，这显然与中国的现代外交有关联。不过，这种“中庸”观点与党的辩证法观点却是有矛盾的，党的辩证法观点认为所有政治现象中的对立面既有统一，又有冲突，这就排除了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对原则进行灵活运用的哲学基础。这种灵活性以其在研究“客观”现实的过程中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而不同于“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一个更为实际的争论是周恩来在其对外政策中有没有采用过“实用主义”的实力均衡原理。基辛格相信周恩来对欧洲经典的实力均衡理论有一种直觉的理解。有些观察家将这种现代的实力均衡理论追根溯源到中国古典战略实践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战略在周的外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对目前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得出的观点也不可不考虑。后者将周恩来“外交风格”中的“实际性”看成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所作的悼词中说，周恩来“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一点并不存在什么争议。

将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国人来进行性格研究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点，但周恩来“外交”形成于盘根错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之中。如果说周在国际事务上的确是个“现实主义者”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个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对他的外交进行全面解释应将其具有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范畴这方面包括进去。诸如“工作作风”、“方针政策”这类概念，在周关于领导原则和相关

政策，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国内国际问题解决所采用的方法等思想的总的发展过程中是清晰明了的。解释这些特殊概念，需要仔细探讨一下中国的外交同中国共产主义一般政治原则及其实践之间的关系。

“工作作风”的概念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典型地包括严格的自我约束标准、对“客观”政治现实要善于随机应变、在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为基础进行的政策制定和个人进行调查研究的過程中进行集体和民主协商。群众路线的“标志”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方针和政策，这两个词相互联系得十分紧密，以致于在日常用语中它们可以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在英语中被译为“政策指南”(Policy Guideline)。弗兰茨·舒尔曼主张将政策译为“特定政策”(Specific Policy)，而将方针译为“总政策”(General Policy)。《辞海》也许更明确地区别了这两个词，它将方针解释为领导确定的理论构想，与“指导”相关；而政策则包含一系列工作原则，或“行为准则”，例如“外交准则”(Diplomatic Norms)。

尽管周恩来在西方被广泛地尊奉为一个完美的外交家，但也不能想象他的“外交”定义和西方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的规范定义会完全一致。已故的海德利·布尔教授为外交所下的定义为：“通过官方代表并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国与国，以及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其它实体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的确如此做了，并认为在国家间进行不懈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他把“外交”看作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周曾经向一群年

轻但勤勉的外事官员们就“两种战争”的区别问题作过讲演。在结束时他说，“外交”与“武打”不同，它属于“文打”。

周最终还是探究到了世界政治的变化。他将“外交”看作是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既不局限于“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实体”，也非仅限于“官方代表”。在反击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争取国际上更广泛的对中国的外交承认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周一直注意国际舆论的威力。他的“人民外交”的根源可以在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初中期推行的统一战线政治的舆论宣传中找到。

对周来说，舆论宣传是外交活动中一个自然而正当的组成部分。在他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最早的一个指示中，他号召他在武汉的部属做到“五勤”。要求这些将来的外交官们做到眼勤，要多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搜集多方面的意见和反映；嘴勤，积极地有效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作风、依靠旁人；腿勤，要多走动，广交朋友，不能深居简出，等人上门。“五勤”后来被用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看来很曲折很棘手的政治环境下，周所具有的达成调和妥协的非凡才能富有传奇色彩，西方很多观察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他的外交。一些台湾学者根据他不断地进行调和而消极地将他比作能倒能起的中国的不倒翁。而且，善于玩逗熊游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曾对周恩

* 藏狗去咬绑着的熊，16、17 世纪流行于英国，后被禁止。——译者

来的“摇摆不定的实用主义”深感不满。他说，这正好让美帝国主义占了便宜。周曾为霍查未能理解列宁的一段话而感到惋惜，列宁说：“妥协，再妥协”。周认为，霍查及像霍查那样的教条主义理论家并没有真正理解在处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天才思想。

周的“现实主义”形式上来源于毛泽东的关于矛盾和实践的辩证理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并非完全有意为周辩护，他曾公开对红卫兵谈过他对周明显的“和稀泥的习惯”的怀疑。但周的“工作作风”用毛泽东自己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矛盾理论来解释完全是无懈可击的。就个人而言，周对毛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心服口服。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和在所有政治活动方面一样，他的“方针和政策”明显地是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而设计出来的，这种结合在 1949 年前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政治理论中就已为世所公认。

在西方，外交事务中的“实用主义”似乎是指一种与某潜在的动态势力打交道的能力，这种动态源于国家安全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和在国际政治等级结构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从这种意义来说，“实用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正式采用过。

在党的历史上，周的名字很少与“实用主义”相联系。“实用主义”是指被当作约翰·杜威和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来理解的，它是与科学的批判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不过，周的对手确想将他的“现实主义”说成就是“经验主义”，其意思就是以所从事的革命为代价，政治上倒退到过分强调事实。在 30 年代，一批所谓的反党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毛泽东

的统一战线政策，攻击党务工作中存在着“经验主义”。在1941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这是指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问题上硬套上一些主观片面而书生气十足的理论。

“经验主义”成为后来“文革”中指责周恩来的一大罪状。而且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仍被含沙射影地比作“大儒”和“宰相”，被指控为躲避革命力量的锋芒而要滑头，被当作历史上的“反动”宰相司马光而受到指责。在历史上，司马光出于嫉妒而竭力反对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王安石。

1975年初，当时周病重在床，他的冷酷无情的对手将“经验主义”列为“主要危险”进行攻击。他们耍的小聪明被毛主席一眼看穿。毛表示，“经验主义”还是40年代早期党的整风运动中的问题，目前反对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就已包括了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结果，周的这些顽固的对手们被当作辩证法学得不到家，需要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训练而被打发走了。毛严厉地呵斥他们“说话吞吞吐吐”。

对“经验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论之间的正确区分在1966—1968年动乱的“文革”极端思潮中遭到了破坏。当时，周成了仅有的能够逐渐使1968年9月以后的中国政治恢复到“实事求是”程序上来的人。

对周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及政策本质作出的下述分析，是在设想党自身的分析传统中的理性范围一直占重要地位的前提下作出的。哈德利·布尔在对“外交”的论述中，对坚持革命正义和推行理性外交之间是否对立存有疑虑。不过，对